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创建伟业

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

1976-1989

刘德军 张荣华 主编
刘 芳 张高臣 著



山东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创建伟业

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

1976—1989



刘德军 张荣华 主编
刘 芳 张高臣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建伟业：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 1976 - 1989/
刘德军, 张荣华主编; 刘芳, 张高臣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8.1

ISBN 978 - 7 - 5488 - 2883 - 9

I. ①创… II. ①刘… ②张… ③刘… ④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76 - 1989 IV. ①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496 号

出 版 人 崔 刚
责任编辑 张慧泉
装帧设计 泰古圣木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 - 86131741
发行热线 0531 - 67817923 86922073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 mm × 240 mm 16 开
印 张 11
字 数 166 千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 - 86131736)

总 序

201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华诞。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民族伟业，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开天辟地到新天新地，从革命到执政，从解放到复兴，整整90年的历史，如同一幅壮丽的画卷，五彩斑斓，丰富厚重，书写着英勇，记录着艰辛，放射着光芒。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部最为惊心动魄的奋斗史诗！跨越90年，既有追寻、追思、追问，更是展示、揭示、昭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如果按基本线索展开，首先是一部奋斗史，即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同时是一部探索史，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还是一部自身建设史，即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三个历史”，就是三条基本线索，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90年的成长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最辉煌之处，镌刻着“革命”两个大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两次革命，都是为了打破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以更快速度实现更大程度的历史性变革和进步；两次革命都工程浩大、气势如虹，都引起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等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因此，两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两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在90年创建伟业中，中国共产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大事，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大事，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90年成长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和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理论成果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飞跃，是辩证把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对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两次历史性创新，是对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得出规律性认识的两大成果。两次飞跃及其理论成果，又是两次革命、三件大事的灵魂。它们在两次革命、三件大事的实践中产生，又反过

来赋予两次革命、三件大事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开辟了两次革命、三件大事通向胜利的广阔前景。

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显示出其他政治力量所不具备的优秀特质和强大政治优势，即：中国共产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又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个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党内民主，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是一个能够吸引和凝聚民族精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能够为人民坚持真理，又能够为人民修正错误，是一个真正没有私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是一个能够在不断学习中提升自己素质和能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铸就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追求、优秀政治品格、优良工作作风、积极精神风貌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蕴含着高远的理想，是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的集中体现；既仰望星空又关注脚下，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客观规律为依托，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彰显了科学理性；关注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中国共产党精神，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先进性、战斗性、民族性和包容性，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不仅夯实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精神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总揽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主宰和灵魂，推进着党的事业健康发展。这些特质、优点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无限生机和活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在90年的成长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对历史经验进行了几次总结，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上对党的历史

经验的高度概括；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用“三个必须始终”总结了80年党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五大总结了近20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党的十六大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用“六个必须坚持”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用“五个必须”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用了“十个结合起来”概括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六个必须坚持”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经验。即：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那便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她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

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研究是一个大题目，内容十分丰富，历史发展纵横交错，且现实性强。为此，我们组织了比较强的研究队伍，由山东轻工业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有关专家联合，实行主编负责与分卷作者撰写的方式，刘德军教授、张荣华教授为总主编，负责全书的总体设计、审核定稿；各卷作者独立负责撰稿，并分署著作者姓名。

本书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90年的光辉历程，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立党、固党、强党为主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伟业历史节点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文献、重大事件呈现，阐述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轨迹与基本经验，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真谛，从而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全书设7卷：分

段、专题立卷，章目体系论述。纵设6卷，各卷时间段为：1919～1935，1935～1949，1949～1976，1976～1989，1989～2002，2002～2011。各卷章内一级目的设置，体现历史发展概貌，统领纵向发展同质问题；横设“基本经验”1卷，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基本经验，体现经验的与时俱进性、启示的反思性。

撰著《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一书，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撰著者又均是在教学之余伏案撰文，加上水平所限与时间较紧，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期望学界同仁、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谨以此书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

刘德军

2011年6月19日

于济南西部大学城学校宅内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	1
----------------------------	---

- 一、揭批“四人帮”，分清大是大非 / 2
- 二、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 / 6
- 三、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 14
- 四、恢复邓小平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16
- 五、局部落实政策，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 21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中的正确抉择	27
----------------------------	----

-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决策走“新路” / 27
- 二、排除“左”、右干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31
- 三、中央组织、人事的重大调整，邓小平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 / 35
- 四、反思历史、认识国情，端正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 37
- 五、整顿党风、制定“准则”，突出党的建设问题 / 39

六、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42

七、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党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 44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起步中制定现代化建设方略 50

一、中共十二大，党制定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 / 50

二、邓小平肯定安徽经验，党中央决定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53

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决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 59

四、改革重点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 61

五、邓小平倡导办特区，党中央决策试办经济特区 / 67

六、“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 72

七、坚持“两手抓”方针，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76

八、调整外交、国际战略，“一国两制”方针形成 / 81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中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92

一、中共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 92

二、中国国门一步一步打开，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 / 96

三、平息国内政治风波，党经受严峻的政治考验 / 100

四、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确立 / 103

五、抓紧党的建设，改善党的作风 / 107

六、开展睦邻外交，打破西方“制裁” / 109

七、党中央决策治理整顿，治理整顿任务完成，改革进一步深化 / 113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6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116	
二、如何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127	
三、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 138	
四、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 143	
五、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 146	
 结 语	 155
主要参考文献	159
后 记	162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

“文革”是对还是错，中国共产党怎么办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① 1976年的中国与1945年的中国有相似的地方，即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种选择：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还是另辟道路？毛泽东在病重期间，对他去世之后的中国走向何方曾十分忧虑。他对身边的人讲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197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他对党、国家和人民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革”中他虽病魔缠身，处境艰难，但仍努力地维持着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

局，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他的逝世引起人们无限的悲痛；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作为军队擎天柱的他深受人民景仰；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他是人民敬爱的领袖，人民对他充满了无尽的敬仰之情。人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的同时，对党、国家、自身的命运也充满了忧虑。“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10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曾沉痛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换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①应该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走向和党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从揭批“四人帮”开始澄清这一问题的。

一、揭批“四人帮”，分清大是大非

“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罪恶昭彰，人民早已对其怨声载道，也可以说“四人帮”恶贯满盈。周恩来逝世后，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四人帮”则采取种种措施予以限制。越是限制，人们越是怀念周恩来，悼念活动规模也越来越大。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这也是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烈展开。“四人帮”倒行逆施、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激起了人们的不满。要结束“文革”、稳定当时的局势，就要粉碎“四人帮”，并深入地批判“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当机立断，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6日夜至7日晨，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叶剑英的提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关于华国锋的任命，中共中央以1976年第15号文件向全党传达。10月7日至14日，中

^① 参见《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由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在10月8日的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其他与会者出于稳定当时局势的考虑也认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很重要。

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了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揭露了“四人帮”进行反党篡权活动的严重罪行，并公布了毛泽东从1974年2月至1975年5月对“四人帮”批评、教育的指示，阐明了揭批“四人帮”的政策、领导等问题。10月20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就在同一天，以华国锋为领导、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中央专案组成立，负责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在1976年12月10日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要经过三个战役，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在华国锋主持下，“四人帮”集团被定性为“极右派”。这次会议也是为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全局性部署和动员的会议。由此，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为主要内容的揭批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就在同一天，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公布了“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四人帮”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图取而代之，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证；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①以确凿的证据揭批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邓小平看到这一罪证

^① 程中原、夏杏珍、刘仓：《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材料后，高兴地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①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目的和罪恶历史。中共中央认为从组织上定性“四人帮”的条件成熟了，197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阴谋推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全会做出了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之后，中央又公布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揭露“四人帮”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并在全国普遍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到1978年底，揭批运动和清查工作基本结束。这股祸害了中国10年，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势力被摧毁。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以各种渠道在全国传播开来。大多数人有重获解放的感觉，感到轻松，感到高兴。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敲锣打鼓地进行庆祝。聂荣臻说：“中国得救了！”张爱萍作诗一首：“忽报一夜阴霾散，扭转乾坤安国邦。白骨授首张正义，伟哉壮举永流芳。”1976年10月16日，香港《明报》发表的社论《打垮江青普天同庆》说：“要打倒江青，不需要什么理由，她这一伙过去已做了无数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大坏事。十年来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这一帮所犯的罪行，只需有其中的千分之一，就该杀头有余。干掉江青和上海帮，正是大大的‘应天顺人’之事。”南斯拉夫的报纸认为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诗人邵燕祥在1982年时写道：“1949和1976北京有过两次狂欢节。我是幸福的，我两次都在狂欢的队伍中。”^②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已开始涉及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② 邵燕祥：《狂欢不再》，载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编：《50年执政启示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论和思想，人们希望把“四人帮”搞乱的思想和方法纠正过来。如批判“四人帮”破坏农副业生产和农村市场，为农村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正名；批判“四人帮”破坏革命和生产，开始强调生产力的作用；批判“四人帮”歪曲和破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应该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按照《历史决议》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具有界标的意义。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同时又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对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决议》予以肯定。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的文章，这样评价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同年（1976）10月，他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容忽视，那就是汪东兴。他参与了整个过程，在策划和组织实施中可以说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时反“两个凡是”，而汪东兴主张“两个凡是”）没有提汪东兴的名字，但历史会记住这位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人。

揭批“四人帮”必然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文化大革命”，说粉碎、揭批“四人帮”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现实要求必须解决这一矛盾。

二、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任务是，如何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彻底地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但是，在1977、1978年两年中，中共中央以华国锋为代表在着手恢复经济、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坚持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出现了党的工作徘徊的局面和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失误。党和国家的工作表现出在徘徊中前进的态势。

“四人帮”垮台后，全党、全国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并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批判运动不断深入，涉及否定“四人帮”的理论体系及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时，由于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遇到障碍。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为粉碎江青集团有过重要的贡献，也试图结束混乱状态，并已着手开辟新的建设局面。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坚持毛泽东的“左”的理论观点，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就提出，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泽东批示的文件，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不能动。1977年2月7日，根据华国锋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这大大地增加了拨乱反正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新的现代化建设的局面难以真正打开。

就像华国锋后来讲的，“两个凡是”不是他的创造，汪东兴、吴德也都有类似的说法，“两个凡是”也不是出于他的手笔。但这一思想符合华国锋的思想实质，被华国锋欣然接受，并大力地予以贯彻和执行。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华国锋。